

# 墨子尊天明鬼思想源于楚风影响

## ——兼谈墨子里籍问题

杨晓宇

墨子里籍问题，因《史记》等古史无明确记载，自汉代高诱至今史学界论说纷坛，其中外国说与少数民族说早已销声匿迹，宋国所在地的商丘对宋国说认为查无实据，亦不再坚持，而孙诒让所一力主张的鲁国说也因证据不足而罢言，按史学研究中的一般情况看，四说绝其三，而鲁阳说便理所当然地鼎居于典。然而，由于近年受名人效应的急功近利思想驱使，山东省滕州市籍的一些学者在一无史载、二无确论的情况下，突然对鲁阳说进行发难，一力主张墨子里籍在山东滕州，即古滕国（张知寒、李永先称墨子为小邾国人亦鲁国人，此说大谬。潘民中先生在《墨子里籍滕州说》一文中评判甚明，故不多谈），并采取先入为主、先声夺人的手法，连续召开研讨会，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笔者认为，从发展本地经济方面讲，此种做法有情可原，而从史学研究角度看，就未免强史所难，令人不能不深感遗憾，其匆匆忙忙为墨子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辩学始祖开具的“临时户口”也是靠不住的。有关墨子里籍在鲁阳的论证，近年国内诸多学者纷纷撰文相举，本文只从墨子尊天明鬼思想的渊源上，来谈一下墨子的楚人特征。

### 一、尊天明鬼思想在《墨子》一书中的论述。

大家知道，《墨子》一书历战国至强秦尚存七十或七十一篇，到了汉代，特别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之后，百家地位一落千丈，而与儒学并称显学的墨家，更成为挹伐之的，自此近两千年内墨学便一蹶不振。到《隋书·经籍志》、梁代典籍《子钞》、唐代《意林》均记十五或十六卷，清代墨学复起，是因为有了毕源、武亿等史学大家的倡导与钩沉，才整理出了宋残存本《墨子》五十三篇，即现在所见到的本子。毕源在其《墨子叙》中明确解释汉代高诱《吕氏春秋注》中的“墨子，鲁人也”为“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鲁国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

在《墨子》五十三篇中，有数篇都表现了墨子的尊天明鬼思想，其中并有《天志》上中下三篇，《明鬼》下一篇，专章进行了论述。如《天志》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又说：“且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已而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已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竭力从事。未得次已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政，未得次已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子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为政于天

子，天下百姓未得明知也。”墨子在此，把为政之等级讲得很明白，那就是天下各阶层均要听命于天子。就此而言，好像与儒家的天命思想一样，其实不然，墨子的尊天思想，是以天为最高准则，以“天义”为行为规范，不但约束百姓，同时也约束天子。而儒家却是奉行皇权天授思想，即天子代表天来政天下，一切以天子的意思为最高准则。因而我们说，墨子的尊天思想要比孔子的天命观更受臣民们的欢迎，从《明鬼下》中，我们也可看出墨子是把“鬼”的力量视为大于常人甚至超于天子，他列举了杜伯与周宣王、句芒与郑穆公、庄子仪与燕简公以及《周书》、《商书》、《夏书》中诸多记载天子不义，祸及臣民，而臣民变鬼后施以报复的故事，并说：“虽有深溪博林、幽涧无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谨，见有鬼神视之”。墨子认为，凡圣贤之王，上尊天意，中事鬼神，下爱臣民，因而天也会说，这是我所爱的，我也要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的人胸怀博大，利人的人德义宽厚，因此才让他也得到报应，亡掉天下。“然则桀纣幽厉，得其罚何以也？其事上诟天，中诟鬼，下贱人”。（《明鬼下》）所以天让他不得终其寿，被称为暴王。

墨子明鬼思想，与孔子儒家之说是相对立的。“孔家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墨家偏偏要讲天志，明鬼，两家完全唱的是对台戏（姜亮夫《楚辞讲绎录》第102页）。”那么，墨子尊天明鬼思想是不是因迷信而落后于孔子呢？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尊天明鬼思想是墨子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让那些握有无上

权力的天子、国王、诸侯们有所警觉，不要任意胡为，要从“义”字出发从事政务，治理国家，多行善事必久立，多行不义必自毙。而不是像儒家那样只作皇权的维护者。《墨子》中还有《非命》上、中、下三篇，其对天命论的评判，可说是一针见血。他说道，如果天下百姓都相信命而不去勤恳劳作，那世界就会越来越糟；天子诸侯都相信命运而不去处理政务，或者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天下将会暗淡无光。“上下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非命上》）

从以上论述看，《墨子》中的尊天明鬼思想是相当浓的，表面看，与非命思想形成了矛盾，但从其深层次探讨，即从其尚同、兼爱、尚贤、贵义的纲上说，其又隐含着内在的统一。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是不可任意分割的，墨子是“把所谓天和鬼的利益跟老百姓的利益相提并论，甚至不加区分。如说：‘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鬼之利’、不外是加重‘人之利’的说明，实际上就是企图证明人间百姓万民利益与天鬼的利益相一致而得到保障”（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第111页—112页）。关于这一点，留待另文专述，此不赘言。

## 二、楚文化是墨子尊天明鬼思想产生的土壤。

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脉支系，它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三晋

文化等一起，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华夏文化巨流，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舟。而楚文化因其所处地域关系，如相融三苗、近临东巴、面对沅湘、远及百越等，被中原诸夏视为荆蛮。祝发纹身，篔路蓝缕，以处草莽。其巫文化的特点尤其较中原各部族突出。在《左传》中，言及楚国政治、军事、经济、甚至设官传嗣等种种事情，都有用卜筮来定夺可否的记载。可以说，占卜对楚人来说具有无上的威力，这就说明，尊天明鬼思想是楚国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深信不疑的。有关这一点，读读楚辞就知道了。楚辞中就有《天问》《卜居》《东皇太一》《云中君》《山鬼》《湘君》等，而作为反映屈原学术思想的诗章《天问》，那一连串的发问，明为问天，实在问人，墨子“把浪漫的东西如神话等，作为学理来使用，成为诸子之一，而屈原的作品则是把神话同他的感情揉合一道，充分表达了他的感情”（姜亮夫：《楚辞讲绎录》第102页）。如果我们把二者来比较一下就明白了。可以这样说，屈原是用艺术语言极尽对“天”的期望，墨子是用思辨来陈述“天”对人世万物的主宰力量；屈原对于天德背道而驰的现实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墨子则冷静地对违背天义者给以警告与批判；屈原只是罗列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平现象，墨子却一语道破产生这些不平现象的原因。我们当然不能对屈原这样的伟大文学家和墨子这样的伟大思想家的不同表达方式苟求一致，但在尊天明鬼思想上所表现的如此接近，是否可以说，二者会有着某种文化习俗的影响与

渊源。“大抵春秋末期，尤其是战国以来的诸子，关于一切事物的认识，都有着自己的逻辑形式，而其中分析最精辟的莫过于《墨子》”（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第九章·（问天）概说》·北京出版社）那么把一切事物分析得最精辟的墨子，却又有大量的尊天明鬼思想，不能不说是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因素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只有在楚文化的氛围内才能形成。可能有人会说，关于尊天思想，诸子中多有涉及，特别是儒家的天命观。笔者认为，墨子的尊天思想与他们都不同。再就是对卜筮的信仰，这是与尊天明鬼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尊天明鬼思想支配下，才会绝对相信卜筮的神圣作用，这一点，即使受周文王所宠信又为历代所推崇的姜子牙，也没有像楚人对卜筮那样坚信不疑，“周武王伐纣。师次于汜水共头山。风雨疾雷，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惧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顺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之，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贤而任能，举事而得时，此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太岁逆，龟灼吉凶，卜筮不吉，星凶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剖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折蓍，率众先涉。武王从之，遂灭纣。”（《诸子集成·孙子十家注》第六页，上海书店出版社）。以神算著称百世的姜太公尚且如此，可见卜筮只是统治者借神力以达目的的手段，但楚人就不

是这样，一切以卜筮之意是从，尊天明鬼思想是深入到灵魂深处的。如楚惠王在决定谁任令尹时，即以放卜来决定。白公之乱时，陈国恃其聚而侵楚，内忧外患之时，楚王在选帅的问题上，亦以放卜得武城尹吉，便让武城尹帅师取陈。楚昭王救陈屯军城父，病于军中，亦以枚卜定吉凶，后死于城父。这些记于楚典中的史实，足以说明枚卜在楚人生活中的地位。而墨子游鲁国，曾两次对鲁国的祭鬼神风气进行评价，认为是“施人薄而望人厚”的虚假习俗，持以否定，我们也可由此看出，墨子之明鬼与齐鲁之祭鬼是完全不同的，怎能认定其是鲁国人而非楚国人呢？

从以上诸方面的比较看，墨子的尊天明鬼思想无疑是与楚文化靠近的，任继愈先生说：“墨子相信有意志的天以外，又相信鬼神。他跟执无鬼论者辩论，曾经运用他的三表，证明鬼神实有……墨子崇信鬼神的用意，如同他提倡天志一样，不是为了欺压百姓，恫吓万民。相反，主观上是为了百姓人民的利益（《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第111页）”。虽然如此，但一方文化的沃土成就一方伟大奇士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与必然，中原齐鲁文化，造就了管仲、孔子、孟子、荀况、韩非等一代硕学，而富于浪漫，滚荡激情的楚文化，也造就了老子、庄子、屈原、墨子等一代大家，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论及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墨子“法夏述周”思想了，因为作为楚国鲁阳人，他既受到楚文化的长期影响，又有着中原文化的

思想印痕，还有着与夏代古文化的历史渊源。《庄子·天下篇》曾言：“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关于这一点，请祥参敝论《“儒墨同源”与“法夏紬周”考辨》一文）。鲁阳在夏代为夏地，在商代属应国，周初封于周公，春秋成为楚邑，而楚为夏禹之后，沿汉水南下而立国，鲁阳及整个楚“方城之外”，又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点，墨子之远祖墨如，且为夏禹的老师，这些林林总总，都说明墨子与夏制，与楚国均有着扯不断、理不乱的关系，限于篇幅，这些只有留待后论了。

总之，墨子尊天明鬼思想显而易见受楚文化的熏陶，说明他是一个楚国人。墨子里籍在鲁阳乃为历史事实，此为治墨者所不得不察也。